

冯桂芬、王韬、郑观应学习思想述评

刘春华

(枣庄学院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, 山东 枣庄 277160)

[摘要]冯桂芬、王韬和郑观应是早期维新派的著名代表人物,他们三人都主张学习西方,然而他们的学习思想又各有其特点:冯桂芬主张向西方学习,制洋器以自强,同时提倡变革科举制度,实行学校教育改革,改变将科学技术视为“奇技淫巧”的陈腐观念;王韬认为变法自强必须学习西方,学习西方不仅要了解其长处,还应看到其短处,不依赖于外国,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。学校教育方面,他主张废除八股时文,改革学生学习内容;郑观应鼓吹学习西方,第一次在政治上提出“君主立宪,设立议院”的政治主张,倡议效法欧美,走变法自强之路。

[关键词]冯桂芬;王韬;郑观应;早期维新派;学习思想

[中图分类号]G122

[文献标识码]A

[文章编号]1004-7077(2015)06-0029-06

冯桂芬、王韬和郑观应是早期维新派著名的代表人物,他们在林则徐、魏源等经世派之后,同地主阶级改良派、洋务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。作为中国近代学习思想史上的过渡性、转折性阶段,早期维新派有自己的特点,它上承经世派,下启洋务派、维新派的学习思想。冯、王、郑三人都主张学习西方,然而他们的学习思想又各有其特点。本文仅就三人的学习思想加以述评,求教于学界同仁。

冯桂芬(1809~1874),字林一,号景亭,江苏吴县人。1840年一甲二名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。太平天国时期,他曾协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。先后在江宁、上海、苏州诸书院讲学。也曾任顺天乡试副主考官,广西乡试主考官。1860年辞官,移居上海,成为李鸿章的幕僚,直至谢世。冯桂芬“少工骈体文,中年后乃肆力古文辞。于书无所不窥,尤留意天文、地舆、兵刑、盐铁、河漕诸政。”“自未仕时已名重大江南北”^[1](P13438)]。其著作主要有《校邠庐抗议》、《显志堂集》等,其中能集中反映他的政治主张、思想观点的是《校邠庐抗

议》,该书上册22篇,下册20篇,附录12篇。该书涉及到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举、教育、外交等内容。书中属于先进水平的思想内容非常突出,具体表现是,冯氏认为西方已经超过中国,并承认中国落后,提出了“采西学”、“制洋器”提倡西学的学习思想。

冯桂芬对魏源提出的“以夷攻夷”、“以夷款夷”的观点不以为然,而对其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倍加赞赏。他在《制洋器议》中说“魏氏源论驭夷,其曰‘以夷攻夷,以夷款夷。’……独‘师夷长技以制夷’一语为得之。”^[2](P198)]他对依靠洋人办军事,雇洋人、买洋船不以为然,而主张“自造、自修、自用”,自力更生创办军事工业。对西方“中华之聪明智巧,必在诸夷之上,往时特不之用耳。上好下甚,风行响应,当有殊尤异敏,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。始则师而法之,继则比而齐之,终则驾而上之。”^[2](P199)]他不仅提出了发展军事工业的观点,而且多次提出在中国发展工商业的主张。同时他还提倡全面引进西学,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。冯桂芬深感中国人“人无弃材不如夷”,他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“夫学问者,经济所从出也。”^[2](P211)]这里

[收稿日期]2015-10-19

[基金项目]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项目“中国近代学习思想研究”(项目编号:11BLSZ02)的阶段性成果。

[作者简介]刘春华(1963-),女,山东牟平人,枣庄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,主要从事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。

的“经济”主要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,凡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都应在学习之列。科技可以创造财富,掌握科技的人才能够富国安邦。他说:

今顾眴然屈于四国(指俄、英、法、美)之下者,则非天时、地利、物产之不如也,人实不如耳。……夫所谓不知,实不如也,忌嫉之无益,文饰之不能,勉强之无庸。向时中国积习长技,俱无所施,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。彼何以小而强,我何以大而弱,必求所以知之,仍亦存乎人而已矣。以今论之,约有数端:人无弃材不如夷,地无遗利不如夷,君民不隔不如夷,名实必符不如夷。四者道在反求,惟皇上振刷纪纲,一转移间耳,此无待于夷者也。至于军旅之事,船坚炮利不如夷,有进无退不如夷,而人材健壮未必不如夷。^{[2][P197-198]}

冯桂芬提出中国诸多不如西方列强处,其中“君民不隔不如夷”的认识,触及到了政治层面,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,也是极少见的。他称赞西方的君民不隔,推崇“米利坚(美利坚)以总统领治国,传贤不传子”^{[3][P191]}的政治制度,已不同于以往任何封建士大夫,使他成为资产阶级改革派的先驱。

冯桂芬在对西方科技文明的认识上,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的数学(他称之为“算学”)与语言。他在《采西学议》中注算学一词时说“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,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。今欲采西学,自不可不学算。”^{[2][P210]}冯桂芬对“彼(西方)知我而我不知彼”的现状极为不满,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学习西方的语言。他在《上海设立同文馆议》中说“互市二十年来,彼酋类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,其尤者能读我经史,于朝章国政,吏治民情,言之历历;而我官员绅士中绝无其人,宋聋、郑昭固已相形见绌。且一有交涉,不得不寄耳目于所谓通事者,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。”^{[2][P250]}又说“夫通习西语西文,例所不能禁,亦势所不可少,与其使市井无赖独能之,不若使读书明理之人共能之。”^{[2][P251]}所以他建议,在

上海、广州推广同文馆之法,“招八旗学生,聘西人教习诸国语言文字,与汉教习相辅而行。此举最为善法,行之既久,能之者必多,必有端人正士、奇尤异敏之资出于其中,然后得西人之要领而驭之,绥靖边陲之原本,实在于是。”^{[2][P251]}

冯桂芬说八股取士“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,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”、“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,以折其廉耻;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,以生其歆羨。”^{[2][P177]}“廩其匠倍蓰,勿令他适。夫国家重科目,中于人心久矣,聪明智巧之士,穷老尽气,销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,又优劣得失无定数,而莫肯徙业者,以上之重之也。”^{[2][P199]}他指出士子们束发就学,埋头于四书五经,不问世事,于国于民都无用处。因此,他主张变革科举制度。在考试内容上,他提出改变科举考试只在四书五经内命题的局限,加试策论,引导士人关心国家的命运。并提出在科举考试中加试数学(算学),改变将科学技术视为“奇技淫巧”的陈腐观念,提出在科举考试中设定“艺能科”,给科技人员比较高的社会地位,凡“工成,与夷制无辨者,赏给举人,一体会试;出夷制之上者,赏给进士,一体殿试。”^{[2][P199]}这种将科技搬进选官殿堂,让优秀的科技人员成为国家官员,参与国家管理,虽然在冯桂芬的时代,只能是大胆而有远见的设想,但这对科举选官制的冲击却是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。

科举制改革与学校教育改革是教育制度改革中的两个相联系的方面,也就是说,要改革科举考试内容,必须建立新式学校。冯桂芬建议洋务派官吏“今欲采西学,宜于广东、上海设一翻译公所,选近郡15岁以下颖悟儿童,倍其廩饩,住院肄业,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,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,兼习算学。……由是而历算之术,而格致之理,而制器尚象之法,兼综条贯。”^{[2][P210]}“三年为期,学习有成,调京考试,量予录用。”^{[2][P251]}这类“翻译公所”、“广方言馆”是一种与当时完全不同的、培养人才的西式学堂。李鸿章、郭嵩焘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
冯桂芬早年师从林则徐,是林则徐的高足,他继承了林则徐、魏源“师夷”、“制

夷”的思想,与林、魏属同一思想体系。他在《制洋器议》中说:

昔吴受乘车战阵之法于晋,而争长于晋;赵武灵为胡服而胜胡。近世俄夷有比达王者,微服佣于英局三年,尽得其技巧,国遂勃兴。安南、暹罗等国,近来皆能仿造西洋船炮。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,求通市,许之;未几,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,报聘各国,多所要约,诸国知其意,亦许之。日本蕞尔国耳,尚知发愤为雄,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?^{[2] [P199]}

其在《善驭夷议》中曾把“夷务”看作是国家“第一要政”,但冯桂芬并没有停止在继承先辈的思想上,而是在继承中有所发展,特别强调自立自主的重要性。他的视野比前辈更加宽广,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也比前者更为深刻明了。因此,《校邠庐抗议》对封建统治所产生的冲击远远超过《海国图志》。

表现在“体用”关系上,冯桂芬对中学西学的立场尤为鲜明。他说“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,辅以诸国富强之术,不更善之善者哉?”^{[2] [P211]}这就是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思想形成前的先声,但他“还不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‘华夷’思想的束缚。”^{[4] [P160]}另外,他对科举制的抨击远达不到后来康有为、梁启超诸人的深度,他只想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,而不是想废除之。

冯桂芬与洋务派的关系更为亲密。他不仅为李鸿章出谋划策,同曾国藩、左宗棠也有一定的联系,其思想和主张无不渗透在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中。有一次同治帝问起冯桂芬的“才识”、“品行”?李鸿章回答“该员好学深思,博通今古,喜为经世之学。……前督臣李星沅、陆建瀛抚臣许乃剑徐有壬历经延请入幕,并襄办盐务及协济筹饷诸局。以本籍绅士与闻公事未免易招物议,现主讲苏州书院,专于闭门授徒,虽年近六旬,精力稍衰,究其品行实为醇正,而识略宏通,学有本原,在江苏绅士固不多得,即近时词臣似亦罕有。”^{[5] [P418]}他也被张之洞推为“中体西用”论的启蒙先贤。李鸿章、张之洞二人尊崇冯桂芬,足见冯桂

芬的思想与洋务派极为契合。冯桂芬与魏源不同,他是官僚兼学者,前后为官10年,官至三品,在晚清的知识官僚中,也可算是官运亨通者。他受儒家文化熏陶极深,重在“师夷”、“制夷”方面,但却始终停留在物质技术层面上,而对儒家的纲常教化、等级制度、伦理道德仍无比的推崇。

二

王韬(1828~1897),原名利宾,江苏吴县人。早年曾热衷于科举,屡试不第,1849年赴上海,在英国人麦都思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,协助翻译科学与宗教书籍,编辑中文杂志《六合丛谈》,广泛接触西学,并于1854年受洗入教,前后达13年之久。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,曾上书当道,提出“御戎”、“和戎”、“平贼”等策。1862年因风传他化名向太平军将领上书献计献策,遭清廷通缉,在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庇护下逃往香港,此后改名韬。他在香港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,后随其前往英国,并顺路游历了法、俄等国。1884年回到上海定居。翌年出任格致书院山长,直至1897年病逝于上海。

王韬早年继承了魏源的思想,并受冯桂芬的思想影响很深。他与冯桂芬是同乡,二人过从密切,他阅读过冯的全部著作。在逃往香港之前,也曾把自己的部分著作如《与周弢甫征君》等寄给冯求教。后来,他又为冯桂芬的《校邠庐抗议》作跋。此外,他还结识当时推崇西学的容闳、马建忠、郑观应等。

王韬洋务思想产生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,他避居香港时期。置身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,能够较多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。而其思想成熟于他主办《循环日报》期间。这时,他已游历了西方一些国家,由睁眼看世界变为躬身验世界,耳闻目睹,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更为深刻的影响。同时,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深入到内地,清王朝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摇摇欲坠,阶级矛盾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,这也深深触动了王韬。这期间他以《循环日报》为阵地,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变法自强的文章。

王韬认为要变法必须学习西方。他

说“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,必自欧洲始。”^{[6][P11]}他以“变通”观点批判了封建顽固派不谙外情,固守成法贪罔虚骄的错误。但在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上,他又坚决反对盲目崇拜西方、一切照搬照抄的做法,主张结合自己的情况,与我相辅而行。他在《弢园文录外编》卷十《上当路论时务书》中指出,对于西方,应该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,不仅要了解西方各国的现状,还要懂得其历史,不仅要知其富强,还要知其何以致富强。学习西方,不仅要了解其长处,还应看到其短处。

王韬以中国传统思想中的“道器”说为变法自强的理论基础。他说:

至今日而谈洋务,岂易言哉?至此几于噤口卷舌,而绝不敢复措其手足。盖洋务之要,首在借法自强。非由练兵士,整边防,讲火器,制舟舰,以竭其长,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。顾此其外焉者也,所谓末也。至内焉者,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,所谓本也。其大者,亦惟是肃官常,端士习,厚风俗,正人心而已。两者并行,故已纲举而目张。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,徒袭其皮毛;所谓本者,绝未见其有所整顿。故昔时患在不变,而今时又患在徒变。^{[6][P27]}

以本末论中西文化之关系,与洋务派的以“体用”论即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思想并无二致。这足以表明王韬思想属于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体系,但是王韬与洋务派官僚还不尽相同,他批评洋务派官僚学习西法“徒袭皮毛”。他认为洋务派虽然在天津、上海、福州、广州等地设局造枪炮船舰,但仅能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,仿效成规,并未真正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,“今日者我国家虽于天津、福州、上海、广东四处设局制造枪炮船舰,而其法犹未大备,仅能步趋西匠,仿效成规,而尚不能求新标异,以颉颃乎泰西。”^{[6][P230]}他认为只有不依赖于外国,走自己独立发展工业的道路,创造性地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,才能与列强并驾齐驱。

在学校教育方面,王韬有自己的改革

主张,他认为学生除学习经史、掌故、词章等“文学”外,还应学习舆图、格致、天算、律例等“艺学”。王韬指出教育与科学的弊端是所习非所用,所用非所长,“学校之虚文宜变也。今所设教谕训导,小邑一人,大邑两人,虚糜廩粟,并无所事。且其人,类皆闾冗无能,龙钟寡耻,不足为士之表率。书院山长只取名誉,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,而每月所课,不过奉行故事而已。是朝廷有养士之名,而无养士之实也。是反不若汉时所立国子监,天下士子犹得读书于其中也。”^{[6][P12]}他主张废除八股时文。王韬在教育方面的主张没有超越封建王朝所允许的范围,亦没有涉及到体制的根本变革。

王韬的学习思想是直接建立在他广博的西方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。他在1853~1858年间,与人合作翻译了《重学浅说》、《西学原始考》、《西国天学源流》等科技和科技史著作,在介绍、吸纳西方科学技术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。“《西学原始考》叙述了西方科学从公元前两千多年到近代科技方面的重大发现、发明及科学人物。”^{[7][P41]}“有力证明了‘西学中源说’的荒谬,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接受西方科学扫除了心理障碍。”^{[7][P41]}“西学中源”本发端于传教士利玛窦等人,他们为了迎合中国士大夫脾胃,曾把西方科技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,后经梅文鼎、王锡阐等人多方论证,又经康熙钦定之后,更成为后来科学家不疑的信条。^{[8][P47-54]}1889年,李鸿章在为格致书院所出的考题中认为,“西学格致,始于希腊阿庐力士托尔德,至英人贝根出,尽变前说,其学始精。逮达文、施本思二家之书行,其学益备。”^{[9][P421]}并要求学子们广泛讨论其源流。“在中国人认识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中,王韬功不可没。”^{[10][P217]}因此,王韬“在晚清士大夫认识西方科学的历史沿革,综合性地穷原究委中,堪称第一人。”^{[10][P217]}

1885年,王韬受聘于格致书院山长一职,开始了长达10年的有关科学教育的生涯。他主张“书院即以格致名,则所命之题、自当课以西学为主,而旁及时务洋务。”^{[11][P44-45]}

从考课内容开始,他在格致书院开始

了一系列改革措施,在格致书院开办了一个比较正规的自然科学学习班,进行初等自然科学教育,使上海格致书院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研习自然科学的新型书院。

王韬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复杂人物,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、改良主义者,又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,更为出格的是他竟与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们有交往,为他们出谋划策。时代风云际会,交织在他的身上,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。

三

郑观应(1842~1922),字正翔,号陶斋,别号杞忧生,广东香山(今广东台山)人。曾当英商宝顺、太古洋行买办。后参加李鸿章洋务集团,经办过轮船招商局、天津电报局、开平矿务局、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。从19世纪六十年代以来,郑观应著书立说,倡言变法自强,其著作有《救时揭要》、《易言》、《盛世危言》等。特别是在《盛世危言》及《后编》中,他除了阐述自己对当时政治、经济问题的见解外,还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,变法图强的设想,事实上这是对他自鸦片战争以来学习西方、富国强兵主张与思想的全面总结。

郑观应被史家称为“戊戌变法前承前启后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”,实际上是士人型“绅商”,即学者与商人的结合。郑观应在上海与傅兰雅、李提摩太、王韬、容闳、伍廷芳、孙中山等思想家、宗教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法学家交往密切。他们对其思想亦多有影响,这些人有的本来就是“西人”,有的则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极深的“西化”了的人,从而形成了郑氏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更为相近的主张与见解。

郑观应指出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已面临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,他鼓吹学习“西法”,效法欧、美,走变法自强之路,但他与王韬一样,借用传统的“道器论”,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基本原则是:主以中学,辅以西学。

且夫国于天地,必有与立,究其盛衰兴废,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。学校者,人才所由出;人才者,国势所由强。

故泰西之强强于学,非强于人也。然则欲与之争强,非徒在枪炮战舰也,强在学中国之学,而又学其所学也。今之学其学者,不过粗通文字语言,为一己谋衣食,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,何尝稍涉藩篱?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,更明大本末,而后可言西学。分而言之,如格致、制造等学,其本也(各国最重格致之学,英国格致会颇多,收益甚大,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),语言文字,期末也。合而言之,则中学其本也,西学其末也。主以中学,辅以西学。知其缓急,审其变通,操纵刚柔,洞达政体。教学之效,其在兹乎!^{[12][P112]}

但他“并没有超越冯桂芬、张之洞的‘中体西用’论,特别是在甲午之战后,其‘变法’思想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。”^{[13][P110]}就是在这种保持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前提下,向西方学习“富强之术”,不仅为洋务官僚所认同,也为清朝中的光绪皇帝、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、吏部尚书孙家鼎、巡抚邓华熙所赞许、看重。光绪帝并命总理衙门印刷两千部《盛世危言》散发给大臣们阅看,自己也“不时披览”。

在郑观应学习思想中惟可取者,是他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、设立议院。这是他超出把船坚炮利作为富强手段的洋务派官僚的地方,这是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提出政治改革要求,这是他在《盛世危言》自序中提出其思想的纲领性表述。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并非全在“器物(科技)”,还在于他们实行议会民主制。早在1880年他就宣扬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,主张中国“下仿泰西之良法”设立下议院。《盛世危言》五卷本面世,郑氏将新作《议院》一文置于首卷。甲午战后,《盛世危言》十四卷本付印,郑氏又增写了一篇《议院》,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议会选举制度,他说:

且选举虽曰从众,而举主非入本籍至十年以后,及年届三十,并有财产身家,善读书负名望者,亦不得出名保

举议员,其杜弊之严又如此。考泰西定例,议员之论刊布无隐,朝议一事,夕登日报,俾众咸知,论是则交誉之,论非则群毁之。本斯民直道之公,为一国取贤之准,人才辈出,国之兴也勃焉。诚能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,参泰西投匭公举之法,以遴议员之才望;复于各省多设报馆,以昭议院之是非,则天下英奇之士,才智之民,皆得竭其忠诚,申其抱负。君不至独任其劳,民不至偏居于逸,君民相洽,情谊交孚。天下有公是非,亦即有公赏罚,而四海之大,万民之众,同甘共苦,先忧后乐,上下一心,君民一体,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?^{[12] (P23-24)}

与郑观应同时代的对西方国家较为了解的精英人物,已多有宣扬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,例如王韬、马建中、薛福成等都看到“议院立而下情可达”、“君惠亦得以下逮”的优越性。但王韬等人旨在进行启蒙式的宣传,而郑观应则当作一项政治改革主张提出来,必然导向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。

郑观应在《盛世危言》卷六《兵政》中

还提出了维护国家独立的主张,强调“当今之世与古昔情形不同,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,练兵民庶足以助官军,可不因时制宜,亟为应变之举乎?”^{[12] (P392)}这是一种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。

郑观应学习思想中比较有价值的还有主张改革科举制,废除八股文。他认为科举制以八股文的优劣作为选士的标准,造成所学非所用,脱离社会现实的不良风气。八股文禁锢思想、消磨志气、摧残学子身心健康,八股取士造成不少人成为无益于国无益于民的废物。他说“时文不废,则实学不兴;西学不重,则奇才不出。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,俾人人所知趋向,鼓舞而振兴之,数年之后,有不人才济济者,吾不信也。况向时发逆、回、苗,皆乌合之众,非比日本、泰西训练节制之师。”^{[12] (P13)}

在中国近代学习思想史上的过渡性、转折性阶段,冯桂芬、王韬、郑观应三人提出了学习西方的不同主张,在各自的文化、学术、政治活动中创造性的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,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赵尔巽等撰. 清史稿(44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7.
- [2] 冯桂芬. 醒狮丛书·校邠庐抗议[M].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1998.
- [3] 转引自熊月之.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96.
- [4] 陈景彦. 西风东渐与中日知识分子的回应[J]. 历史研究, 2006 (3).
- [5] 李鸿章. 李鸿章全集(1) [M]. 北京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1998.
- [6] 王韬. 近代文献丛刊·弢园文录外编[M].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2.
- [7] 戴建平. 王韬科学形象初探[J]. 江西社会科学, 1999 (11).
- [8] 陈卫平. 从“会通以求超胜”到“西学东源说”——论明末至清中叶的科学家对中西学关系的认识[J]. 自然辩证法, 1989 (2).
- [9] 转引自楼宇烈, 张西平主编. 中外哲学交流史[M]. 长沙: 湖南教育出版社, 1998.
- [10] 屈宝坤. 晚晴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几点认识的演变[J]. 自然科学史研究, 1991 (3).
- [11] 王尔敏. 上海格致书院志略[M]. 香港: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 1980.
- [12] 郑观应.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·盛世危言[M].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2.
- [13] 杨全顺. 洋务派与“中体西用”[J]. 广西社会科学, 2006 (1).

[责任编辑: 何 芳]